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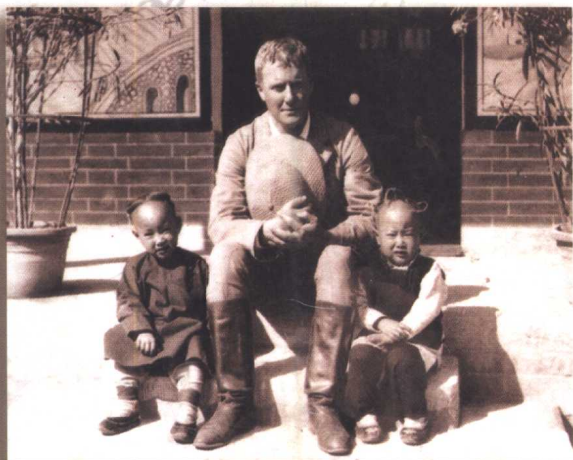
的

莫理循

Morrison of Peking

作者〔澳〕西里尔·珀尔

译者 檀东铨 窦坤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的莫理循/[澳]西里尔·珀尔著;檀东铨,窦坤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7
ISBN 7-5334-3664-4

I.北... II.①珀...②檀...③窦... III.莫理循
—传记 IV.K836.11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7406 号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TT Imprint, Sydney Australia.

Copyright © Cyril Pearl 1967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Fujian Education Press.

(中文版专有权属福建教育出版社)

书 名 北京的莫理循
作 者 [澳]西里尔·珀尔
译 者 檀东铨 窦 坤
责任编辑 林冠珍 林 琳
责任校对 高 钰 梁 莉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福州梦山路 27 号(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9.375
插 页 8
字 数 468 千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300
书 号 ISBN 7-5334-3664-4/K·98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3726019)调换。



1894年莫理循身着中式服装，徒步穿越中国，此为他离开昆明之际
(米歇尔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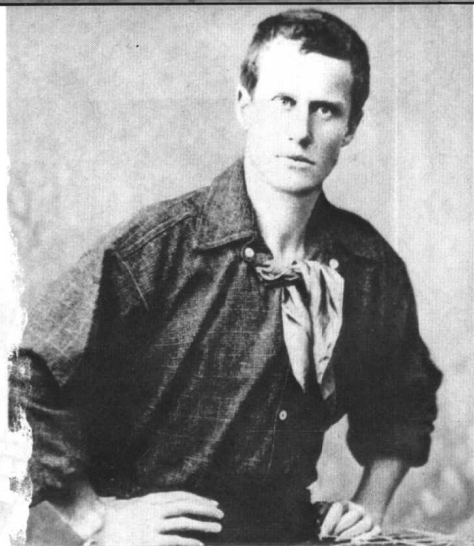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
(泰晤士—赫尔顿广播电台图片资料馆)



北京英国公使馆
(泰晤士—赫尔顿广播电台图片资料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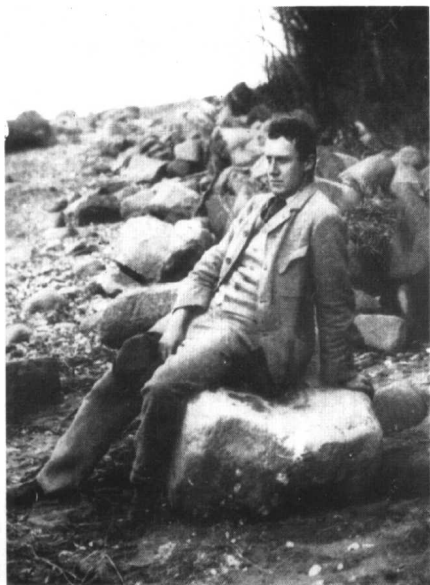
紫禁城午门
(泰晤士—赫尔顿广播电台图片资料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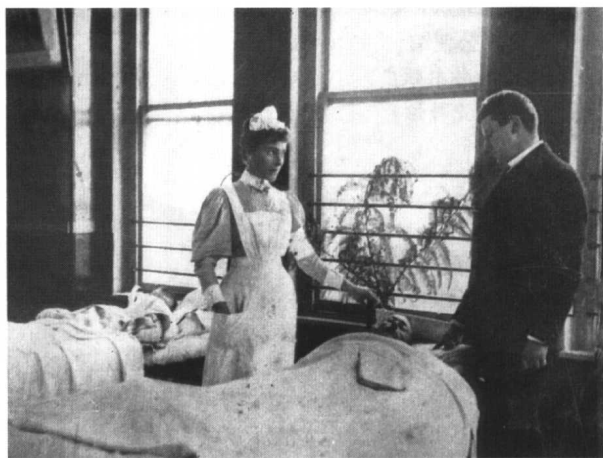
19岁时的莫理循
(米歇尔图书馆)



1883年12月1日，悉尼《公报》漫画家的作品“跛行”，对莫理循在新几内亚的不幸遭遇极尽讥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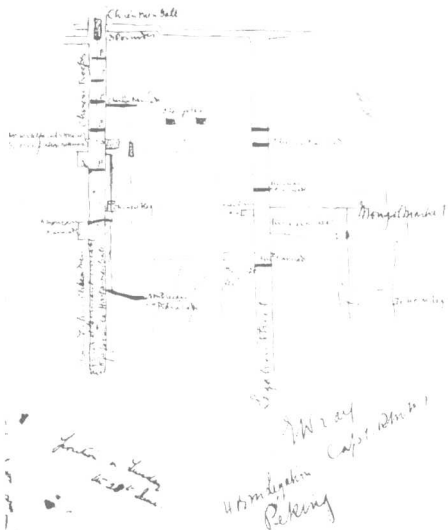
1887年，莫理循在美国
(米歇尔图书馆)



1891年，莫理循在澳大利亚巴拉腊特医院担任医生
(米歇尔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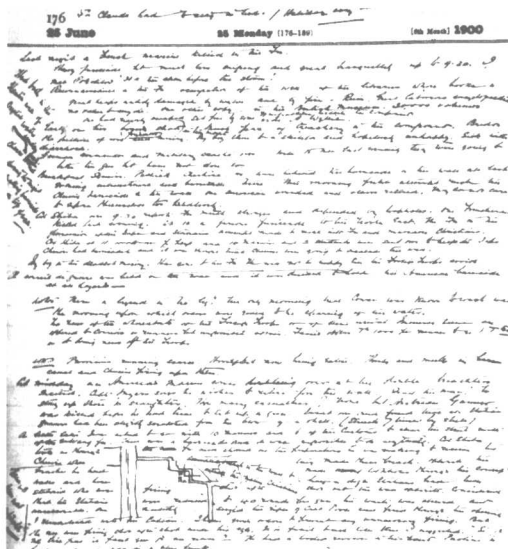


英国驻北京公使克劳德·宴纳乐爵士
(泰晤士—赫斯顿广播电台图片资料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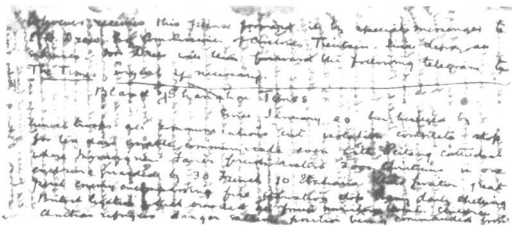
1900年6月28日，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公使馆卫队的瑞士尉交给莫理循的防御图

(米歇尔图书馆)



义和团运动期间莫理循的一页日记
(1900年6月25日)

(米歇尔图书馆)



义和团运动期间莫理循写在油纸上准备捎出去的消息，尺寸为5×2.25英寸

(米歇尔图书馆)



义和团民在欧洲军队前被同胞
处决

(泰晤士—赫尔顿广播电台图
片资料馆)



义和团运动后北京的使馆区

(泰晤士—赫尔顿广播电台
图片资料馆)



《泰晤士报》总经理莫伯利·贝尔
(《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姬乐尔
(《泰晤士报》)



1905年，莫理循在北京自己的家中
(米歇尔图书馆)



1910年莫理循及其随行人员从北京前往西土耳其斯坦的路上
(米歇尔图书馆)



1912年的珍妮·莫理循
(莫理循夫人)



莫理循于1911年离开伦敦之际
(米歇尔图书馆)

(米歇尔图书馆)



1917年莫理循和他的三个儿子——
伊恩、科林和阿拉斯泰尔
(米歇尔图书馆)



1917年，莫理循将图书馆卖给日本三菱财
团的岩崎男爵，此为他与经手人小田切万
寿之助等人的合影 (米歇尔图书馆)

NOTICE .

To All Foreign Missionaries, Merchants and Other Re-
sidents in Peking, greeti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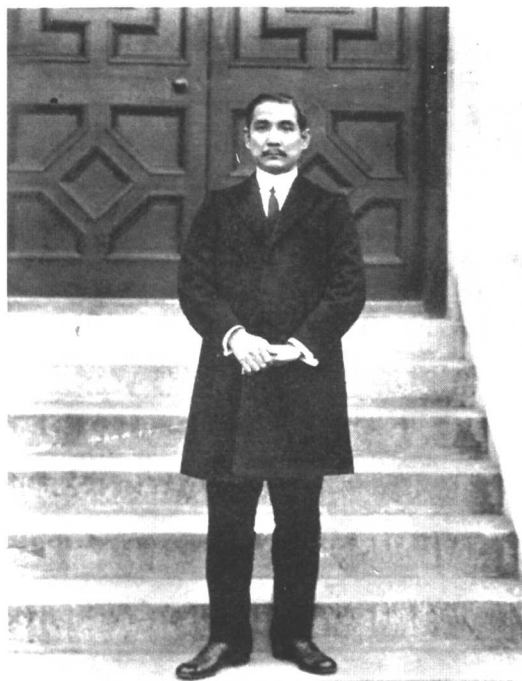
The unexpected disturbance last night on the part of a section
of my soldiers has filled me with much sorrow. It is one of my
chief duties to see to it that order is preserved in the Capital and until
last night I was uniformly successful. To you, 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 I wish in particular to convey my sincere regret for the untoward
incident and the very natural anxiety that you felt. Every measure
and precaution is now taken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such a
disturbance.

(Signed) YUAN SHIH-KAI.

Provisional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March 1, 1912.

1912年3月1日，袁世凯在北京兵变后发出的通告 (米歇尔图书馆)



孙中山

(泰晤士—赫尔顿广播
电台图片资料馆)



莫理循被任命为中国政府政治顾问后，袁世凯送给他的有亲笔签名的照片

(米歇尔图书馆)



美国领事官司戴德于1912年为莫理循画的粉画像

(米歇尔图书馆)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府統總大國民華中大

Peking, 2 August 1912.

My dear Dr. Morrison.

Herewith the Document. It is neither an Agreement nor yet a Contract nor yet a Compact. It is a free and spontaneous Invit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to you who has kindly signified his assent and approval by the attachment of his signature. It is the most honourable invitation ever extended by China to any foreign gentleman and expressed in the most courteous language possible as shown by the characters 聘任.

The President sends you his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Tsai Ting Kan

1912年8月1日，莫理循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从10月起担任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此为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寄此合同时给莫理循的信函

(米歇尔图书馆)



AUSTRALIAN EMBASSY BEIJING

George Ernest Morrison was a pioneer in the history of Sino-Australian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a 24 year period in China, Morrison distinguished himself as a lifelong friend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 staunch supporter of engagement with a China that was undergoing significant and difficult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Morrison's diverse interaction with China, from adventurer to reporter to political advisor, gave him a unique perspective into the multi-layered China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rrison was one of many Australians to be torn between these two vastly different countries. Even on his deathbed, Morrison felt a need to be in China, feeling intensely the contradiction of being a citizen of two countries but belonging to neither. Although the influence of British colonial imperialism was keenly felt through his life and often reflected in his reports, he nonetheless, was so strongly attached to China that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have died there.

Mr Warren Ker of the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Melbourne reported that Morrison was able to reveal to the world "a power of which most the world had scarcely dreamt and, which must develop and make its influence fel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Morrison's candid and forthright reports planted the seeds of a lifelong fascin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rrison of Peking"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work, a work which will help to reinforc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for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our two cultures.

We are grateful to the efforts being made by Fujian Education Press and the many historians and linguists who contributed to this translation and the commitment they have to the ongoing work of Sino-Australian friendship. The translation of Cyril Pearl's important work will reinforce this friendship and will make a meaningful promotion to cultural exchange.

Sean Kelly

Counsellor, Public Affairs and Culture

Australian Embassy Beijing

June 2003



AUSTRALIAN EMBASSY BEIJING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是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他在中国度过的24年,正是中国经历重大而又困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年代。在这动荡的年代中,他成为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朋友和中国坚定的支持者,并因此而闻名。莫理循曾以探险家的身份在中国旅行过,以记者的身份报道过中国,以政治顾问的身份帮助过中国。正是他丰富多彩的经历才能使他以独特的眼光观察清末民初中国的各个层面。

中澳两国千差万别。许多澳大利亚人对这两个国家都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难以取舍。莫理循也是其中之一。甚至在临终之际,他还想到中国去。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强烈的矛盾,觉得自己是这两个国家的一分子,但又觉得不为她们所接纳。虽然英国殖民帝国主义强烈地影响着他的一生,而且经常在他的报道中反映出来,但是他却珍爱着中国,甚至愿意在中国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墨尔本澳大利亚商会的华伦·柯尔先生称赞说,莫理循能够向全世界展示“一种世界上大多数人很少能梦想到的力量。这种力量肯定会得以发展,并影响着世界史和国际舆论。莫理循的报道既公正又坦率,在中澳两国间播下了能产生持久魅力的种子”。

《北京的莫理循》是一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著作,有助于增强中澳友谊,为读者了解两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福建教育出版社和许多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为翻译此书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为进一步增强中澳友谊作出了贡献。对此我们深表谢意。翻译西里尔·珀尔的重要著作能增强中澳友谊,对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将起意义深远的作用。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

肖恩·凯利(柯胜利)

2003年6月

中译本序

张 海 鹏

《北京的莫理循》中译完竣，出版者和译者希望我写几句话。我似乎觉得有些关系，推辞不得，就接下了译稿。

1996年夏，我有机会出席东京的学术会议，因久仰东洋文库的盛名，顺便访问了东洋文库。在东洋文库的地下书库里，我发现了“莫理循文库”，其收藏品非常丰富，令我惊异、感叹。“莫理循文库”的收藏品是日本人从莫理循手中购买的。我心中暗想，从甲午战争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莫理循先是作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接着在1912年起作为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生活了20年，对中国社会政治上层以及远东国际关系极为了解，他的藏书为什么不能留在中国呢？现在看了《北京的莫理循》中译本，方才知莫理循在中国的日子里，利用《泰晤士报》的工资和中国政治顾问的丰厚酬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他的居处，建立了个人的图书馆。年老离开中国前，他本希望把他的图书馆卖给中国政府或者个人，似乎无人应承。他觉得这批图书资料不应该离开亚洲，便以35 000英镑卖给了日本。日本人后来把“莫理循文库”扩充为东洋文库。如此区区小

事,也是当时国力的反映。

还在20年前,当时的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曾邀请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来所访问,我曾出席过骆惠敏教授的演讲会。骆惠敏教授介绍他搜集莫理循1895~1920年间与他的上司、同事、亲信、友人的往来函件并编辑《莫理循书信集》的经过,增进了我对莫理循其人的了解。随后,近代史所翻译室陈霞飞女士组织北京若干资深翻译工作者把这厚厚两大本《莫理循书信集》译成了中文,1986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副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情,它提供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情况和围绕中国问题引起的列强之间的种种斗争。《莫理循书信集》的原编者澳大利亚骆惠敏教授曾经指出,这本书信集的上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历程”,下半部分则体现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的故事,莫理循成了当时中国事务中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人物,尽管莫理循本人对这个职务的虚幻很厌倦,多次想辞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问黎澍对《莫理循书信集》中译本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莫理循身后留下了大量书信、日记和备忘录,这些文件大多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是认识那个动乱时代的中国的重要史料。照骆惠敏教授的说法,已经编辑出版的莫理循书信缺乏莫理循日记所具有的优点——对情况的熟悉和自然的流露。莫理循日记经过整理,一直存放在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里,至今未能出版。幸好有一位澳大利亚著名记者、作家西里尔·珀尔在日记解禁后第一个读到了它,并以这些日记为基本资料,撰写了《北京的莫理循》的著作。这本书在1967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看来,莫理循在北京的经历,给了西方读者很大的兴趣。虽然著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北京的莫理循》一书更多的带有新闻记者的笔法,可读性强,也许这是它吸引读者的地方。但是它依据的主要资料是莫理循的日记,记载了莫理循

在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的活动,通过他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莫理循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活动和见解,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不同态度,确有可以为近代史研究者参考的。翻译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尤其与此前翻译的《莫理循书信集》对照起来读,对于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研究这个时期列强对华态度,乃至研究莫理循本人,都是很好的素材。

近代时期的中国,被动地融入了世界体系,与西方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来华的西洋和东洋人士,包括清末民初政府聘请的各种顾问(如政治顾问、军事顾问、法律顾问等)、工程师、学校教员、政府官员,乃至出访外国的代表团团长,不管带着什么目的,许多人都曾经留下了各种文字记录,包括各种历史图片。这些资料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有一些还藏于私人之手,其中有一些已经出版,更多的还没有出版。我建议正在努力寻访这些文字记载的学者,多做一些移译的工作,也建议有眼光的出版者,多出版这样的译著,把它们介绍给中国学者,这对于学术界是莫大的恩惠。福建教育出版社这次毅然买得《北京的莫理循》的版权,组织翻译,邀请了英语语言方面的专家和历史学者共同从事,知识互补,译笔流畅,是值得称许的。

我因先睹为快,说上面的话,作为感想。

2003年4月3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前言

北京的一条大街曾被命名为“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①。现在人们称其为“前莫理循大街”(Former Morrison Street)这条街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英文名,是为了纪念乔·厄·莫理循——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他后来成为中国问题的世界级权威。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他在公使馆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无畏。1912年,他受聘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由于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对袁世凯深恶痛绝,所以“莫理循大街”被冠上不光彩的前缀,成了“前莫理循大街”。但是,平心静气而言,在外国人中没有人会比这位刚直不阿的澳大利亚人更热心、更公正地支持中国。

未到北京之前,莫理循游历过许多地方。他在太平洋的一艘黑奴贩卖船上当过水手;他曾赤手空拳、孤身一人从澳大利亚北部步行到南部;他曾率领一支考察队,深入当时尚未开化的新几内亚进行考察;他曾以徒步和骑马的方式,从中国的上海跋涉到缅甸。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足迹遍布除西藏外的中国所有省份。他是个伊丽莎女王一世末期的遗民,沾染着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帝国主义习气。

^① 注:指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英文的“Morrison Street”路牌自1915年起一直保留到1949年春。

在他罗曼蒂克的眼光中,那些由流氓无赖、空想家、诗人、承包商、占卜预言家、红利追逐者组成的稀奇古怪的阴谋集团的行动竟成了“十字军的壮举”。他和帝国主义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以及帝国主义最赤裸裸的鼓吹者詹姆森都会过面,而且引以为荣。他赞同帝国主义高级辩护士寇松、张伯伦、米尔纳和罗兹的观点,认为英国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而且这一使命即使称不上神圣,至少也具有历史意义。从这些人的一些言论中,我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观点:寇松要把他的《远东问题》一书献给“那些相信大英帝国在上帝的眷顾下能为人类创造前所未有的福分的人”;张伯伦宣称,英国的使命是扩张大英帝国的疆土,把英国的正义和法律带给千千万万“生活在愚昧无知中的人”;米尔纳则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些还生活在愚昧无知中的人竟然没能意识到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英国之所以要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完全出于一片仁慈之心,目的是为他们造福;罗兹这位“大英帝国的罗耀拉^①”,深信大英帝国是神的工具,启示着人类的光明前途,并要建立一个神选的秘密精英阶层来为大英帝国服务。他们都不是伪君子,他们的的确确都这么认为。正如维奥利特·马克汉姆(1913年,他和莫理循在北京成为莫逆之交,他对莫理循非常钦佩。)30年后所写的那样:“英国是个占有统治地位的仁义之邦。许许多多(其中包括我自己)都满腔热忱地承认英国的使命……就我们看来,她所承担的一切使命都富有价值。她的缺陷在于版图太小,难以处理好形形色色的心理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最有影响,而且经过血泪的反复验证,因此显得尤为突出:那些“尚未开化”的非欧种族,无论多么愚昧无知,“都宁愿维持自己极为糟糕,甚至是腐败的统治体系,而不愿意在异族的统治下俯首帖耳”。莫理循觉得这一点实难理解。虽然他对英国统治者不

^① 罗耀拉: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耶稣会士的行动信条是:为了教皇和教会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里用来指罗兹的信条: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